

中國近代
史上的關
鍵人物中

莊
練 著



中華書局

序

歷史是人事活動的積累。手握國家軍政大權的領導人物，他們的思想言行，更直接與國家命運的休戚榮辱息息相關。所以，爲歷史人物作傳記及撰寫評傳，早就成了歷史研究工作的一個項目。準此而言，爲某一特定時期的當政人物分別作傳，藉以覘見此一時期的歷史演變道路，當然也是可做的事了。

十九世紀時的中國，正當西方勢力劇烈衝擊，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其影響及于今日者，尙且十分重大。咸豐、同治之間，內則有太平天國及捻、回之亂，外則有英法聯軍之入侵，當時不但東南半壁糜爛不堪，卽是廣大的華北平原亦充滿了寇亂，而自新疆甘肅陝西以至雲南，又復爲叛回所據，所謂完善之區，充其量不過全國省區的二分之一。此時幸有恭親王奕訢及軍機大臣文祥主持於內，曾、胡、左、李等一班中興將帥效命於外，同心匡濟，竭力堵柱，卒能內靖大難，外拒強敵，弼成同治光緒之間的小康局面。這一些重要人物的文治武功，拯救中華民族的國運於至危垂絕之時，他們的功勳，必將在歷史上永著聲光。但不幸的是國家最上層的領導人物接二連三的發生變故，咸豐不壽，同治夭折，慈安暴崩，光緒柔懦，這一切的一切，都只造成了慈禧太

后以一介女流而獨攬國家政柄達數十年。到了後來，她的好尚貨賄與耽於享樂，更導致清末政治日益走向貪污腐化的道路。清政之不綱，從此遂如江河之日下，而同光中興的小康局面，從此亦永成歷史之陳迹矣。看了這些興衰變化與賢不肖人物之進退情形，怎不令人瞿然瞭悟人事因素在歷史上的重要影響。所以，要瞭解晚清末年的歷史何以如此災晦否塞，國事蜩螗，研究其時當政人物的言行思想，更不失爲一種可行的方法。

這一本小書，題爲「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目的就在選擇當時具有關鍵性的某些重要人物，藉他們的行事施爲，來顯示晚清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之肇生，其原因究竟爲何？坊間所刊行的中國近代史，佳作如林。但這些著作因體裁所限，其敘述總是全書性，詳於此必略於彼，對於當時若干重要人物的言行思想與他們的實際影響，反而不能詳爲敘述，對於竭欲知道清末歷史演變何以如此而不能如彼原因的讀者，總未能破其疑團而鑒其所欲。本書之作，即是希望以人事活動的經緯來補足通史敘述的缺略，進而使讀者得以深一層窺見歷史演變的趨向。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資料，汗牛充棟，本書亦不過酌取若干，管得一簣而已。由於大事方面的活動總比較富于趣味，所以也比較能引起讀者的興味。假如能藉此而使讀者諸君對近代歷史的研究發生興趣，那就是更好不過的事了。

照筆者個人的估計，够得上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稱爲關鍵人物的帝王君臣，爲數不過二十人左右。如果把這些重要人物每人都以三、四萬字的篇幅勾畫出一幅大致的輪廓，就其關鍵性的言

行思想作一簡單而明白的交代，對於近代史的研究瞭解必定可有相當的幫助。只因四季出版公司的負責人亟欲將已寫成的刊印單行本問世，所以只好以未完稿的形式呈獻於讀者之前。所賸餘的部份，一俟明年寫成後，再行出版，先此向讀者諸君聲明，並致歉意。

收在這本書中的文字，都在青年戰士報新文藝副刊上發表。承蒙主編胡秀先生的厚愛及讀者諸君的歡迎，使筆者得以有勇氣繼續在該報撰寫。惟因筆者學識謬陋，窒漏及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尚希望高明的讀者不吝指正，以便在以後撰寫時得以有所改進，不勝企盼之至。

當此初集刊印成書之日，略述緣起，以當序言。最後，對於四季出版公司負責人願使我這本簡陋的小書得以出版問世之厚意，尤當申致感謝之忱。

莊

練
序
於
南
港
寓
盛

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中冊 目錄

序

一

李鴻章

七七

翁同龢

一四九

同治與光緒

二三一

大小醇王

李 鴻 章

近世史家論述清代「同光中興」的重要人物，曾、左、胡以外，依次當及李鴻章。曾國藩、胡林翼、和左宗棠的「中興」事功，主要在於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及平捻。而李鴻章則不但在平定太平天國及平捻兩大戰役中都會立下赫赫之功，其後並且以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的身份握持北洋軍權，參與甲午戰爭的和戰大計，在晚清歷史上留下了極深的影響。之後，他以中國外交特使的身份往聘歐洲，與俄國訂立中俄密約，更召來歐洲列強瓜分中國的極大危機。這對於中國近數十年來的國勢與地位，影響更大。梁啟超撰李鴻章傳，將李鴻章的一生分爲兩個主要時期——前一時期爲太平天國及平捻時期，名之爲「兵家之李鴻章」；後一時期爲從事政治及外交之時期，名之爲「洋務及外交家之李鴻章」。前一時期的李鴻章，乃是「同光中興名臣」之一，在歷史上的評價應是譽多於毀。後一時期的李鴻章，因爲晚清歷史的重心已漸由「安內」轉向「攘外」，不但肆應困難，而且非李鴻章的才識能力所能應付，於是不免謗言叢起，而致毀多於譽。其中的是非恩怨究竟如何，在李鴻章死後七十年的今天再來加以探討研究，應該是可以得到一種比較客觀而公正之結論的。

李鴻章是安徽合肥縣人，字漸甫，號少荃，排行第二。父名文安，道光十八年進士，官至刑部督捕司的郎中，記名御史。文安有子四人，長名瀚章，後來作到湖廣、兩廣的總督，官位與李鴻章相亞，只差沒有拜相封侯。三子名鶴章，四子名昭慶，官皆不顯。李鴻章是在道光二十四年恩科順天鄉試中的舉人，因為其時李文安在京供職，李鴻章照例可以「官生」的名義在北京應試之故。三年之後，又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鴻章中式二甲三十六名進士，朝考點庶吉士，入翰林院教習，時年二十四歲。少年高科，從此開始了他的一生仕宦生涯。

道光二十七年與李鴻章一榜的進士，後來頗有一些仕宦顯赫的人物。如狀元張之萬，後來做到大學士與軍機大臣。與李鴻章同居二甲的沈桂芬，更在同治初年就當上了軍機大臣。做到總督的，尚有李宗羲、何璟、馬新貽、沈葆楨等人。以通外交諳洋務出名的則有郭嵩燾。至於李鴻章，後來不但入閣拜相，而且先封伯，後封侯，為同年之中最為顯赫的出類拔萃之人，說來實在很不平凡。

李鴻章父名文安，號愚荃。所以李瀚章的號是筱荃，鴻章是少荃、鶴章是季荃，都從愚荃一名引中而來。近人李書春撰李鴻章年譜，以「少荃」為鴻章之字，顯然錯誤。所以然之故，大概由於李鴻章貴顯以後，一般書信往來及口頭稱呼，都稱李鴻章為「少荃」，而未用「漸甫」二字，所以到了後來，「漸甫」二字逐漸湮沒不彰，後人不察，就以為「少荃」即是鴻章之字了。其實則現存的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恩科直省同年錄中，尚有李鴻章的祖貫及名諱可查。在此書的第

四十四頁中，除了李鴻章的三代名諱以外，並證明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行二，道光癸未（三年）正月初五日吉時生」，乃是以「安徽廬州府合肥縣優貢生」的資格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李書春撰李鴻章年譜，以為李鴻章是在安徽原籍中的舉人，也錯了。這些小事雖然無傷大雅，但歷史所講究的是真實，無論大事小事，都需要信而有徵，所以也可以在此提出一說。

梁啟超所撰的李鴻章傳，說他「初以優貢客京師，以文學受知於曾國藩，因師事焉。日夕過從，講求義理經世之學，畢生所養，實基於此。」曾國藩與李鴻章的父親文安是同年進士，李文安官部曹而曾國藩官翰林。由於翰林院的工作清閑而有充份的時間與前輩及同儕講求經世義理之學，因此奠定了曾國藩一生的學問基礎。李鴻章在此時能有這麼好的一位父執來作爲他的老師，自然得益非淺。由於有這一種密切的關係，李鴻章之於曾國藩，一方面是年家子的晚輩，一方面也是學生。曾國藩後來對於李鴻章栽培提拔，不遺餘力，固然是由於李鴻章自己的學識與才具足以得到曾國藩的賞識，這雙重身份的親密關係，也是有很大作用的。

清宣宗道光三十年，李鴻章在翰林院教習三年期滿，散館考試成績優良，得以「留館」，充任翰林院的「編修」，官正七品。翰林院的編修雖然祇是七品小官，但清代的漢籍名相，什九由此起家，問題是在各人進入翰林院以後的學問與德業修養如何。咸豐二年，李鴻章在翰林院應翰詹大考，列爲二等，得蒙皇帝的文綺之賞。這本是翰林陞官的良好開始。無奈此時的清代中國，已因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而受到了極大的震撼，承平時代表讀書羣望的翰林生活，在此時已經不能

適應，連丁憂在籍的曾國藩都需要在湖南創辦團練，擔負起保家衛國的重大責任來了。李鴻章的原籍安徽合肥，此時亦已遍地萑苻，伏莽四起，勢不可能容他繼續在京中做他悠閑自在的翰林官。於是，到了咸豐三年的正月，皇帝就命他隨同侍郎呂賢基回籍辦理團練，像曾國藩一樣地要以文官帶兵，放下筆桿，改拿槍桿。

李文忠公全集的卷前附有清史館所撰的李鴻章傳，此傳與後來的清史稿李鴻章傳不同，其中敘述他在咸豐三年奉旨回籍辦理團練以後的情形，較清史稿本傳爲詳，摘敘如下：

「三年正月，命隨同侍郎呂賢基回籍辦理團練。五月，禦賊於和州之裕溪口，敘功賞六品頂戴，並賞戴藍翎。四年，分攻含山，克之，賞加知府銜，賞換花翎。五年五月，丁父憂，仍留營。十月，從克廬州府，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六年，從克無爲州，賞加按察使銜。七年，以迭次剿匪出力，奉旨交軍機處記名，遇有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八年，侍郎曾國藩駐師江西，留襄營務。」

這一段文字，敘次李鴻章以翰林院的七品編修奉旨回籍辦團，如何因軍功而屢陞至賞加按察使銜，遇有道員缺出，請旨簡放的情形，甚爲詳盡。道員是四品官，較之編修七品，大得多了。李鴻章以後的作官本錢，由此得來。但李鴻章在本鄉辦團，既已因軍功而屢陞至四品的候補道，遭際不能算是不好，何以後來却又棄而去之曾國藩幕中，屈居曾國藩的幕職呢？據清史稿李鴻章傳所說，是因爲他在安徽帶兵打仗，「遭衆忌，無所就，乃棄去，從曾國藩於江西。」如照趙鳳

呂所記的「書合肥軼聞」一文看來，則其中情形，頗爲難堪，亦摘抄如下。

趙鳳昌撰惜陰堂筆記「書合肥軼聞」云：

「咸豐初年，以翰林在籍辦鄉團。其時皖南北土匪遍地，各鄉築團以禦，而又此團攻掠彼團，擾無虛日。朝廷派勝保辦皖軍務，勝疑合肥，預防閑之。一日侵曉，土匪攻鄉團，合肥領團出戰，竟敗退，直抵本團。時已逾午，飢甚，入宅不見一人，蓋先避去。疾往廚舍，飯正熟。灶低窪，即翹一足踏於灶沿，一手揭蓋，一手取盞，直遞口狂咽，不暇用箸，亦無一蔬。隨咽隨呼曰：『同隊快幹（快食之謂），好跑（即逃之謂）。』隊中宋某，後已保游擊，人極樸實，在粵爲我言之。言今日但見赫赫之中堂，不知有當年之態度矣。飽後仍退，忽報勝保從後路來。合肥頗惶急，慮有不測，前又有敵，不得已迎謁之，述告匪情。勝仍令向前擊匪，略派隊助之。幸敗賊，勝保始無辭。旋投曾幕。」

上文所說的勝保，乃是當時督辦安徽軍務的欽差大臣，滿洲鑲白旗人。此人在咸豐年間以「知兵」得名，頗著戰功，然而其驕縱貪淫及專恣跋扈，好行殺戮，在當時亦應首屈一指。他懷疑李鴻章據地自雄，名爲團練而陰與土匪勾結。如果他真的因此而向皇帝奏上一本，李鴻章真有可能死無葬身之地。何況當時的安徽巡撫福濟並不知兵，一切戰守措施，多不盡合宜。李鴻章在這種情形之下協助地方當局辦團自衛，實在也很難做出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業來。然則他之因遭受他人排擠而頗萌退志，也正是很合理的事。但是他在入居曾國藩幕中之後，亦悒悒不甚得意。還有幾項

原因可尋。第一，李鴻章在咸豐七年就已因軍功保陞至「遇有缺出卽行請旨簡放」的道員，現在來到曾國藩的營中，仍祇是一個沒沒無聞的幕僚，未免會使李鴻章感覺不得志。第二、當時曾國藩以侍郎督辦江西軍務，官未甚顯而權任亦不甚重，李鴻章在此時入曾幕中，自然亦不易得志。第三，李鴻章在本籍辦團，屢經戰陣，自覺應可獨當一面；如今沒有機會可以讓他在帶兵打仗立功，自然亦難以使他滿意。但這雖然是李鴻章自己的想法，在曾國藩看來則並不然。他以為李鴻章雖然在安徽帶兵多年，而對於軍隊訓練、戰法研究、戰略運用等等基本要素，都缺乏瞭解，實在不可能在大規模戰爭中達到克敵制勝之目的。爲了陶冶其志氣及培養其領導才能，他實在需要把李鴻章留在營中，以便遇事歷練，隨時施予啓迪訓誨。薛福成庸菴筆記中有一段關於此事的記述，極可注意，錄之如下。

「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聞曾文正公督師江西……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頃之，差弁絡繹而來；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僚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而往。文正終食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爲之悚然。蓋文正素詭傅相才氣不羈，故欲折之，使就範也。傅相初掌書記，繼司批稿、奏稿。數月後，文正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謂，從前歷佐諸師，茫無指歸，至此如識

南針，獲益非淺。」

李鴻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後追隨團練大臣呂賢基、及安徽巡撫福濟，此二人既非戡亂之才，對於領兵作戰更是缺乏經驗，李鴻章在他們手下帶兵及處幕，自然沒有本領可學。曾國藩所以能在舉世滔滔之中發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訓練湘軍，使他們成爲一枝能征慣戰的隊伍；他自己所擬訂的通籌全局、十道分進、對太平天國展開全面防堵圍剿的戰略方針又極爲正確，因此方能使他在對太平天國的戰爭中掌握主動，著著進逼，終於使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完全傾覆。假如曾國藩也像同時一班督撫大帥那樣地沒有高瞻遠矚的眼光，那末，曾國藩不免也會像向榮、和春、勝保、福濟、等人一樣地碌碌無成，李鴻章也決不能從曾國藩那裏學到卓越的打仗本領。曾國藩死後，李鴻章作聯輓之，說：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爲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此聯的上半，充份道出了李鴻章師事曾國藩而盡得其軍事政治才能的事實。然則李鴻章之入居曾幕，實可說是他一生事業的重要關鍵，拜相封侯，悉基於此。至於曾國藩之賞識李鴻章，除了曾國藩素知李鴻章才氣過人這一項因素之外，下述二事，亦爲重要的原因。

近人徐一士所撰的凌霄一士隨筆說，曾見某筆記中的記載，李鴻章居曾幕時，嘗爲曾國藩草一奏疏劾劾安徽巡撫翁同書，最得曾國藩之激賞。其時曾國藩因翁同書對練首苗沛霖的處置失

者，以致激成大變，他本人又在定遠失守之時棄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責，極爲憤慨，意欲其死矣，而難於措辭。蓋翁同書乃前任大學士翁心存之子，參心存在皇帝面前的「聖眷」甚隆，出生公子布滿朝野，究應如何措辭，方能使皇帝決心破除情面，依法嚴懲，而朝中大臣又無法利用皇帝與翁心存之間的關係，來爲翁同書說項，實在很費躊躇。他最初使某一幕僚擬稿，覺得甚不滿意，不願採用。而自己動手起草，怎麼說也不能妥當周匝。最後乃由李鴻章代擬一稿，不但文意極爲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極爲警策的文字，說：「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就。」這段話的立場如此方剛嚴正，不但使皇帝無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爲之鉗口奪氣。所以曾國藩看了之後，大爲激賞，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書亦旋即奉旨革職拿問，充軍新疆矣。就事論事，李鴻章此稿，深得奏議文字的「辣」字訣，使人無可置喙於其間。李鴻章有此吏才，自足以使曾國藩對他刮目相看。此是第一事。至於第二事，則是李鴻章表現在力爭李元度不應被奏劾時所表現出來的剛毅態度。

李鴻章對於李元度被曾國藩具疏奏劾一事所表現的態度，見於薛福成的庸菴筆記，云：

「既而文正進駐祁門。傳相謂祁門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謂絕地，不如及早退軍，庶幾進退裕如。文正不從，傳相復力爭之。文正曰：『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會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師守徽州，違文正節度，出城與賊戰而敗，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詣大營，又不留營聽勘，徑自歸去。文正將其疏劾之。傳相以元度嘗與文正同患難，乃率一幕人往爭，且曰

：『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文正曰：『我自屬稿。』傳相曰：『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文正曰：『聽君之便。』傳相乃辭往江西，閒居一年。適官軍克復安慶，文正移建軍府焉。傳相馳書往賀，文正復書云：『若在江西無事，可即前來。』傳相乃束裝赴安慶，文正復延入幕，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

李元度之於曾國藩，不但是同時在湖南辦團練的夥伴，而且曾處曾幕五年，後來且追隨曾國藩轉戰贛東皖南各地，勞苦備嘗。所以李鴻章以爲曾國藩爲了顧及二人之交誼，決不可以秉公奏劾。但曾國藩却以爲「行法當自貴近始」，如果李元度違令失機之罪可以不究，將來人人效法，湘軍的軍紀如何還能維持？所以曾國藩站在法的立場，以爲決不可以因私而害公。但曾國藩雖然在這件事情上不曾對李鴻章讓步，對於李鴻章之能够以個人的進退堅持自己立場的剛毅性格，還是非常欣賞的。試看他在一年之後去信邀李鴻章再度入幕，又復「禮貌有加於前」，遇有「軍國要務，皆與籌商」，就可知道李鴻章此時在曾國藩心目中的地位，較之一年以前又增進了不少。所以然之故，自然是由於他欣賞李鴻章的性格了。吳汝綸撰李鴻章江蘇建祠事略，謂，「曾國藩前後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爭議是非者，李鴻章一人而已。」所指的亦即是這一件事。可知曾李相知之深，這件事的影響很大。

曾李相知日深，對李鴻章的事業前途，當然有很大的影響。這又可以分作兩方面來說，第一是正的方面，第二是負的方面。

是正正的方面，是指曾國藩自此對李鴻章多方提掖，所以李鴻章不久就能够以總督的幕僚出組方面，膺任江蘇巡撫，立即成爲封疆大吏，開軍府於上海，從此建立他以軍功封侯的事業基礎。在太平天國之亂平定以後，曾國藩並且汲汲以自己的兩江總督職位相讓，使李鴻章再建平捻大功，成爲他事實上的衣鉢傳人。負的方面，則是使曾國藩生前所樹的政敵也把李鴻章當作他們的敵人，在他當權秉政的時候，把攻擊的箭頭一齊射向他的身上。關於這兩種情形的演變，可以留待後面再說。現在且轉過頭來，繼續敘述李鴻章如何由曾幕出任江蘇巡撫，開創真正屬於他自己的事業。

薛福成庸菴文集續編卷下，「書合肥伯相李公用滬平吳」云：「自大江以南，皆淪於賊，其僅存者，則提督馮子材以一軍守鎮江府城，巡撫薛煥與署布政使蘇松太道吳煦等皆棲上海，僅保松江上海兩城，與黃浦以東三縣而已。既而浦東之奉賢、南匯、川沙等城皆被賊擾，松江亦失而復得，上海屢受困逼，勢岌岌。吳煦在滬，頗諳洋人性，能聯絡爲用，以厚餉募勇數千，使洋將薩爾以泰西陣法部勒之，名曰常勝軍，戰稍有功。復以重利啗英法兩國兵官，兵官欲保通商口岸，皆盡力助戰守。上海當江海綽綽口，雖寇氛日逼，而商賈輻湊，關稅厘金，視承平時旺數倍。煦執利權，亦頗有綜核才，然宦江蘇久，爲積習所漸，不能自破，且素不知兵，僅倚洋將禦賊。洋將恃功驕倨，緩則索重賞，急則坐觀成敗。巡撫以餉權在煦，而才又不如煦，驟然不能有所爲，

噶諾而已。前後募勇五萬餘人，以不能訓練，遇賊即北。吳中紳耆避寇在滬者皆知其危，屢議赴曾文正公安慶大營乞師，巡撫以下皆弗善也。然意雖不憚，而無辭以阻之。……」

這一段話，約略寫出了李鴻章出任江蘇巡撫以前的地方情形——江蘇全省，江北尚多完善之地，江南則只有鎮江一城尚爲清兵所有，此外就只剩下一個上海孤城，靠着外國洋兵的出力幫助，總算還沒有被太平軍所吃掉。但上海四面皆敵，洋兵打仗並不可靠，爲了希望守住上海，逃難住在上海城中的江蘇耆紳，只好寄望新在安慶立下大功的兩江總督曾國藩，能够派兵到上海來援助。但曾國藩雖然以兩江總督的職位而統轄蘇、浙、皖、贛四省的前敵軍務，他自己所掌握的兵力，却只有曾國荃用來圍攻安慶的兩萬多湘軍而已。爲了進行下一步的圍攻南京計劃，他此時正派曾國荃回到湖南去添募新軍，以便積極展開長江下游的軍事行動。在曾國荃所增募的新軍未到之前，曾國藩現有的兵力，只能用來鞏固新近收復的地區，並沒有餘力可以兼顧上海。但是，到安慶來乞師的上海紳士們，曾經提出一個足可使曾國藩大爲歛動的建議——助餉，却又使他不得不另想辦法，以求達到東援上海之目的。

臺灣學生書局所影印出版的湘鄉曾氏文獻，收有曾國藩在咸豐十一年十月間寫給他老弟國荃的一封信。此信並未收入刊印本的曾文正公全集內，其中所透露的，就是曾國藩此時所構想的援滬腹案。原信說：

「上海富甲天下，現滬人二次前來請兵，許每月以銀十萬濟我，用火輪船解至九江，四日可

到。余必須設法保全上海，意欲沅弟率萬人以去。已與請兵之官商訂定，渠買洋人之夾板船數號，每號可裝三千人，現已放二號來漢口，不過放五號來皖，即可將沅兵全部載去。目下專主防守上海一隅，待多（隆阿）破廬州，鮑（超）破寧國之後，渠兩軍會攻金陵，沅弟即可由上海進攻蘇常。不知沅弟肯辛苦遠行否？如慨然願往，務祈於正月內趕到安慶，遲則恐上海先陷。如沅弟不願遠征，即望代我謀一保守上海之法，迅速回信。」

此信中所說的「沅弟」，即曾國荃，別號沅甫。曾國荃此時正在湖南原籍募練新兵，曾國藩希望由他帶兵一萬人前往上海負責防守，俟多隆阿與鮑超肅清皖南皖北之後，分兩路向南京進兵，即由曾國荃從上海西攻蘇州常州，以收東西夾擊之效，其立意可說非常週到。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主要倚靠湘軍之力。但因湘軍並非國家的經制軍隊，其糧餉與給養需要領兵之人自行籌措，因此湘軍的兵力始終不能視需要情形儘力擴充，而籌餉一事，也一直是曾國藩所最感苦惱的問題。咸豐十年以後，曾國藩雖已被任命為兩江總督，有了可以徵收糧餉的地盤，但其時江浙各地大部淪陷，賦入有限，湘軍的糧餉還是得靠湖南湖北二省的接濟，仰面求人，甚非得已。如今上海方面來乞師的士紳們一下子提出了可以按月接濟十萬兩銀子的建議，無異天降財神，怎不使曾國藩躍然色喜呢？爲了獲得這巨額餉銀的收入，他必需保全上海餉源之地；爲了保全上海，他必需派兵援助。但是他第一個想到的援兵主帥，却是曾國荃。這也有其必要的理由。第一，曾國荃是他的親弟，遇有立功名的好機會，他應該予自己兄弟以優先的機會；第二，曾國荃在圍攻